

經濟論衡



許滌新 著

經 濟 論 衡

許 滌 新 著



耕 耘 出 版 社

目錄

代序 刷淨俗流學派的灰塵

一：怎麼學起經濟學來？——二：刷淨俗流學派的灰塵——三：對於學習經濟學的
態度

第一 是「社會價值」還是勞動價值？

一：又來了一位杜林先生——二：關於價值——三：利潤資本主義生產——四：地
租·地價——五：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時間——六：「狂妄而不負責」

第二 關於購買力平價說

一：購買力平價說的要點——二：使用這一學說的場合——三：貨幣數量說的錯誤
——四：關於「兩國貨幣對內購買力之比」——五：被紙幣現象所迷住的俗流見解

第三 所謂人性論

四一

2

一：用人性代替欲望——二：經濟思想中的人性論——三：爲什麼抬出人性論來呢？——四：人性論在中國

第四 全體主義是什麼東西？

五六

一：全體主義代表了誰？——二：全體主義的思想淵源——三：史班的方法論——四：什麼是史班的社會？——五：經濟是「全體」裏的肢體嗎？——六：「達到目的之手段的結構」(?)——七：所謂「機能」和「優能」的概念——八：價值·價格·市場——九：全體主義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敵人

後記

八九

刷淨俗流學派的灰塵（代序）

——怎麼學起經濟學來？

當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並沒有做着一次學習經濟學的夢。那價時候，中國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出版物，正像雨後的春筍一般，在出版着。我的學校，雖然僻處在一個冷靜的城市，但是新式的切書邊的書，被一個具有服務精神的「青年書店」，帶到學校的門口擺列起來了。我也就在這種氣氛之下，讀了中國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一些創作。沒有幾個月，中學快畢業了，每當息燈未睡之時，總欲想一想：「將來學什麼呢？」那時的答案，是希望學文學創作。

進入C城的C大學以後，一心一意是打算學習西洋文學的。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中讀正在過着奔騰澎湃的日子。人民大眾在怒吼。青年們也在怒吼。爲了改善生活，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那時就有人說，工資是物價的成本，工資提高了，物價不是要上漲嗎？物價漲了，曾經提高了的工資不是「此漲彼消」，實際上，還不是同沒有提高一樣嗎？這個問題，很便當時一些工會工作者爲難。因爲大家都不深切了解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而勞動力有兩重性的緣故。我亦爲答覆這個問題而苦惱着。是時坊間出現的一些小冊子，如李漢俊譯的「資本論入門」（日本人著的），李季譯的「價值價格與利

潤」，雖然隨手買到，但總是讀不下去。還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到困難的，這就是東方雜誌上常常登過一些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經濟的論文，什麼通貨膨脹，什麼馬克下跌法郎上漲，讀起來總是頭昏腦脹，莫明其妙。這兩個問題老是縈繞在我的腦際，老是刺激我，驅迫我去弄個明白。但是，我並沒有在這個時候，決然捨去懷古的情趣和審美的興緻。學習創作的念頭，仍然在我的意志中佔着統治的地位。

沒有多久，氣候突然起了變化，我被迫離開學校，回到偏僻的故鄉去了。在那兒，暗地裏寫了幾篇小說和小詩。那是以當時的見聞為題材的，但是，自己讀起來，覺得太單調了，太不成樣子了，於是便轉而想學習文藝批評。那時出版不久的文學大綱，便是我的主要讀物。這一部龐大而有點繁雜的巨著，使我越讀越不知如何是好。好在創造社出版的「流沙」與「社會批判」，時常登載一些用唯物史觀解釋文藝的文章。讀到這些文章，使我高興極了！這是把握文學思潮的線索，這是分析文學作品的利器，於是，我便重溫以前讀不懂的唯物史觀公式了。那個時候，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尚未譯出，英文本在內地又買不到，感謝胡漢民先生的「唯物史觀的批判之批判」中載有馬克斯關於唯物史觀的斷片。

唯物史觀對於社會與文藝之解釋，使我越讀越發生興趣，於是我便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借得一些唯理唯物史觀的書，但這類書，當時在中國翻譯得較多的是考茨基與河上肇的著作。我便從這些書

有學素的著作中，去學習唯物史觀。經濟是社會的下層建築，是社會的基礎。越學習，越引起我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興趣；過去那些不能回答的問題，又常常要求我去求得解答，再加上自身的實際生活的刺激，於是，我便捨棄對於文藝的鑑賞，一百八十度地轉過來，決心學習這一門冷酷而充滿着戰鬥性的政治經濟學了。

二 刷淨俗流學派的灰塵

在一個僻處海角的 A 大學裏，我進了經濟系。教我們經濟原理的有二位教授，一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碩士，一位是德國柏林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前者是崇拜馬先爾的，後者則崇拜松巴特。但與我們關係更多的是前一位。他認為馬先爾的經濟原理太高深。故改授李特的書。李特的社會聯帶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但其價值論則完全成為奧國學派的俘虜。我讀了它，不但不能使我國客上面所述那個工資問題，反而使我更糊塗了。難道世事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麼？難道蘋果樹上生着蘋果而資本的果實就是利息麼？（他們是把利潤和利息混為一談的）難道工人的工資是決定於其勞動的邊際效用麼？難道資本只是作為迂迴之用的生產手段麼？這些問題又一個一個的襲擊着我。我去問這位教授，他笑着說，「問題的答案就如書上所說的」。

這樣的書，的確確沒有解決我所為難的問題。沒有多久，我到 S 埠去了。在 S 大學裏，教我們

學習經濟的是 S 先生，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雖然在內心上他是一位信仰邊際效用說的人，但同學的質疑，使他不得不在講價值論的時候，把李嘉圖、馬克斯與奧國學派的見解，分別介紹給我們。這種比較的方法，對我們的學習，收效是很大的。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消耗了極大部份的時間在圖書館中讀古典派的幾本著作，讀英譯的資本論，間亦涉獵各種經濟思想，但經過了一番比較之後，我便漸漸地看出俗流派的經濟學說，都是建築在沙灘上沒有鞏固基礎的房子。他們把那些脫離生產過着荒淫逸樂的生活的人們的消耗的寄生觀念，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他們把幻想中的沙漠旅行者對於飲水的渴望作為決定價值的張本；他們把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混為一談，他們不把商品作為研究的對象而把財富作為研究的對象，照他們的說法，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就有資本的存在，照他們的說法工資是決定於勞動之「邊際效用」的，勞動力的購買者並沒有從勞動者身上取得比工資更多的價值。然而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並沒有什麼資本，用勞動的「邊際效用」去解釋工資，是無法解釋利潤的本源的。誠如馬克斯所說：「他們所成為問題的，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祇是與資本有益仰有害，便利仰不便利，違背警章仰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趨利害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真正的科學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在學理的研究中，在每一個問題的比較中，使我一步一步的認識俗流派的真相。

不僅學理本身的研究比較，使我一步一步的弄明白，更重要的還是客觀事實的發展與印證，使我更加堅強這種認識。第一件事是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件事是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與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

中國社會史論戰暴露了托洛茨基派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之破產。他們不從生產關係去把握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而從輪船航船等交通工具的比較上得出謬誤的皮相的結論；新思潮派是看清中國社會的封建性的，但他們却忽略了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特質。只有全面地從動的邏輯去把握，才能認識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社會。這種看法，是那些見木而不見林的人或玩着生意經的經濟學家所不能夢想的。他們把經濟範疇看成孤立的物，隱藏在物的外衣之下的人與人的關係，都被看落了，因此，依據這些教條，是看不見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係，亦看不見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剝削關係的。制度學派的主將康孟斯的一位高足（這位先生後來做了漢奸），回到中國來沒有幾天，便大發其中國可能發展成爲美國的妙論；過了不久，他看見官場的一些不可見人的事情之後，便潸然的說：「照現狀，中國是不能發展產業的了。」這就是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證明：俗流學派的經濟學是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的。只有新興的政治經濟學，才能使我們正確地認識現實，並且獲得改造現實的辦法。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使我更明白地認識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的矛盾。一切從觀念論去解釋恐

慌的說法，都在無情的事實之前失色了。只有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越來越爲客觀事蹟之發展所證明，特別是戰後（指第一次大戰）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期的趨勢之預見，更是證明馬列主義的偉大力量。而對着世界恐慌的日益惡化，社會主義的蘇聯却在向上的走着榮繁的道路。一九二九年蘇聯的生產恢復了大戰前夜一九一三年帝俄的水準，此時資本主義世界亦完全復原並且一度超過戰前水準，可是，到了這個時候，資本主義與蘇聯經濟之間，便開始一個劇烈的分歧了。「當資本主義經濟日益頹下，於一九三三年把它的生產降低百分之四十的時候，蘇聯的經濟便以歷史上無比的速度開始上昇。」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之所以能如此之雄飛突進，就是它取消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正是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說所揭發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成功，都是在事實上證明馬克斯經濟學說的正確。

客觀的事實，解決了理論上尙不能一刀兩斷問題的。新古典學派，心理學派及制度學派一些尙殘留在腦子中的觀念，完全被無情的事實所驅逐了。到這裏，我才敢說自己是一名學習馬克斯主義的學生。

三 對於學習經濟學的態度

雖然自己確定了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與點觀，但對於資本論的理解還只是一些皮毛。有一個時

期，爲了生活的艱苦，常常在東方雜誌與新中華上投稿，那時寫的文章，很少能從學理上消化材料。雖然那時我是在一羣同患難共死生的帥友的指導下學習，縱然那時我對於世事的趨向有更明確的認識與了解，但，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去理解經濟學理，去分析經濟問題的能力，還是差得很遠的。忙碌的日子飛也似的渡過着，我無暇去補救這一個缺陷。但，使我有暇補救這一缺陷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民國二十四年春，我被人移居在一個連散步和說話都不許可的地方。尖銳而辛酸的生活，迫得人幾乎發瘋了。但這倒不使我怎樣難過，最不好受的是寂聊和空暇的襲擊。沒奈何，只好轉而埋頭讀書。在千難萬難之中，我獲得了日文本的何士肇經濟學大綱與拉奧二氏第八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我知道它們有毒素，就用深入細嚼的態度去研究它們，去批評它們，去與同住的朋友討論（當然是低聲暗語）。書，並不是好書，但是，那種方法，那種態度，的確使我在這方面推進一步了。抗戰的炮火，結束了這種索居的生活。我又在急劇的洪流中，研究一些索居時所讀不到的名著，分析一些在發展在變化的問題。然而，還仍然是淺薄得很的。

爲了學習的進步，我抱着下列的態度：

第一，研究政治經濟學不應只讀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而且還應研讀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因爲「馬克斯和恩格斯給了歷斷前的資本主義底基礎以分析，列寧和斯大林根據着資本論底基

總論點，往前發展了馬克斯底經濟學說，揭露了作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底規律性」（G·加克的「馬列主義是統一的整個的學說」）。跟着客觀事實的發展，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同樣在發展着。毛澤東的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民族解放運動的新發展啊！

第二、研究政治經濟學絕不可只在經濟現象上做工夫，必須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內心去；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有相當的哲學修養。馬克斯的經濟學說之所以與布爾喬亞的不同，就是在於他從運動、變化、發生、發展和死亡的觀點，即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上去研究近代有產者社會的經濟。因此，離開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去研究經濟學，結果一定會陷入俗流學派的泥坑之中。

第三、研究政治經濟學單單熟讀原理是不够的。熟讀原理或死讀原理的結果，必定把原理當成教條。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馬列主義的經濟學，那是絕對要不得的。因此，我們必須在經濟局勢的發展上去把握馬列主義。這就是說，必須從活生生的經濟問題的研究與分析上去學習馬列主義。譬如我們今天是處在抗戰已經七年的大後方，經濟的困難正在襲擊着我們。研究這種困難的根據，指出它的出路與趨向，乃是學習馬列主義經濟學者之所有事。如果閉着眼睛，不看現實，而醉心於書本上的原理，縱然把原理背爛熟了，但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却並沒有什麼用處。政治經濟學的教條主義，其禍害是不可輕視的。因此，研究政治經濟學必須是理論與實際底統一。

第四、要把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實際統一起來，必須認清我們今日所處的環境，必須弄清今天中

國是什麼社會。社會經濟的性質不同，則其經濟範疇的內容亦就不同。例如地租，在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超平均利潤的那一部份剩餘價值，而中國現行的地租則是前資本主義的方式，它不僅是超平均利潤的一部份，而且包括了平均利潤甚至相當於可變資本的一部份。以工資來說吧，中國現行的工資，一般還不能稱為勞動力的價格，因為工資制度中充滿了前資本主義的超經濟的剝削。以資本來說吧，外國資本、買辦資本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亦是不能一樣看待的。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分明不是為中國打算。例如日本強盜在淪陷區中所設立的什麼國策會社，其目的完全在咀吸中國的人力與資源；買辦資本則在啜拾外資在華掠奪所得的一些殘羹剩飯，它們所幹的勾當，乃是為外國資本服務。官僚資本是高級的買辦資本，但同時又充滿着前資本主義的封建性，它是中國式的獨占資本。民族資本顯然與這三者不同，但它有清它自己的特點——如脆弱性、依賴性與投機性等等。對於這些問題如果不具體地以中國的實際情形為着眼點，那是很難不陷入教條主義的泥坑中的。

第五、研究政治經濟學必須緊要地把經濟與政治聯系起來。一些俗流學派的經濟學者，是單純從生意經的眼光去研究經濟的。這樣的研究，只能在美金換法幣的算盤上跳舞，只能在抽象的統計數字上活動。這樣的研究，是不能了解事實的真相的。經濟是政治的基層，而政治則為經濟的集中；則是保護某一階層的經濟權益的條件。離開了政治，就無法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的本質；離開了人民大眾，就無法使經濟學成為物質的力量。這就是立場的問題。

我所抱的這些態度，自己並不敢說完全是對，一定是對，所以提出來祇在供願意研究這一門的科學的朋友們之參考吧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是「社會價值」還是勞動價值？

——又來了一位杜林先生

距今六十六年前，柏林講師杜林先生，以「社會主義專門家及改良家的資格」，以吉訶德一般的勇氣與瘋狂，向科學的社會主義作「莫明其妙」的挑戰。不幸得很，這一位浮浪的騎士，在恩格斯的駁斥之下，他那種市儈社會主義的本質，便原形畢露地呈現在人們之前了；他那種五光十色的市民階級理論的斷片，便像深秋的落葉，狼藉地不可收拾了。不圖在六十六年後的中國，仍有人有鑒有色地扮演杜林先生的角色。表演一齣引人發笑的悲喜劇。

這一齣悲喜劇之演出，是有它的來源的。這就是近來泛濫的反理性主義的逆流。反理性主義是獨占資本的意識形態。在這種反理性主義的逆流中，哲學方面表現為直覺主義、神祕主義、唯靈客觀的觀察與思考而推崇朦朧的直覺與盲目的意志；政治思想方面表現為對民主政治之懷疑而以馬基佛里的唯力主義為聖經；經濟思想方面表現為庸俗的效用價值說，充分地表露其市儈與不勞而獲者的觀點。在這裏，披着現代化的外衣底所謂「社會價值論」，便是它的代表之一。爲了篇幅之限制，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限於這個理論。

二 關於價值

讓我們借用杜林先生一句話吧，「價值論是決定經濟學體系的價值之試金石」，社會價值論者亦是同意這一點的。因為它不但企圖以此去建立其經濟思想的體系，而且企圖以此去建立其革命理論的體系。

社會價值論的特點有四：

第一、價值就是效用。「一種物品之所以有價值，以其能滿足人類生活上或種需要」，更明白說：「凡是那些事物對於人類生活能發生維護的作用的時候，我們就說它們有價值。所以價值是對人類生活上有作用的東西。太陽光、空氣、雨水、五穀、草木、鳥獸……我們可以說它們是有價值的東西」，把使用價值當作價值，把使用價值與價值混在一起，這是庸俗經濟學者的拿手好戲。奧國學派的所謂邊際效用說，早就把這一點造成它的體系了。是的，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一個必需的條件，但是，它是不能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它是不能決定交換價值的量的。馬克斯說得很精練：「當作使用價值，各種商品是在質上各不相同的；但當作交換價值，牠們祇是在量上互異而已，並不包含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這一個矛盾，社會價值論者是無法克服的，於是他們就不得不另找出路了。它說：

「但是像現代的經濟學家說起來，對於雖然在人類生活上而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物品，雖然具有使用價值，但是沒有交換價值，如空氣與日光，不能說是有價值。價值是需要人類耗若干時間用勞動力工作後才能得到的事物所具有的東西」。在這裏我們可以進而看見：

第二、價值就是生產者「所耗的勞動力」。例如「一條魚從河裏捉起來，魚的價值就等於漁夫所耗費的勞動力」。不說勞動而說「勞動力」，可以證明商品的價值，在社會價值論者眼中，是由生產這些商品所必需維持工人的費用來決定的。在現社會中，這就是由工資來決定的了。可是這種說法是矛盾的，因為「勞動者所生產的東西以及他的勞動力所化的費用，正好像機器所產之物及機器本身價值一樣，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工人在十二小時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價值，是和他勞動時間內及其後休息時間內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完全不同的。在這些生活資料內，按勞動生產力發達程度，可以包含三小時四小時或七小時。假定這些生活資料的生產需要七小時勞動吧，則據俗流派還種主張，十二小時勞動的產品，具有七小時勞動產品的價值，那末，十二小時勞動就等於七小時勞動了，十二便等於七了，這不是笑話嗎？

第三、價值是「人類歷史社會勞動之積累，包含有生產工具的創造、新式生產工具的進步的生產性、技術的進步、土地的開墾等等」，更明白說：「從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引用新式生產工具以後的生產過程中，是會生產一部份為直接參加生產者所能生產的價值以外的價值」。依此而言，生產工具